

日本法西斯的铁蹄在安徽践踏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队在卢沟桥发动侵华战争。11月12日占领上海，11月30日沿太湖南岸西进的日军侵入安徽，占领广德开始，至1938年底，全省有40多个县市被日军占领。被占领的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52%，人口占54.2%，耕地占61.6%。长江、淮河、铁路、矿山以及主要工商城市芜湖、蚌埠、安庆、合肥、滁县、宿县等全被日军占领。从此，这些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达8年之久。

日本侵略军队在安徽占领区，实行殖民统治的方针及其形式，是秉承其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进行修正和改变。1940年3月汪伪安徽省政府上台之前，是日军入侵的前期，是日军从直接法西斯的屠杀威慑政策，过渡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实行傀儡统治的转变。

疯狂地进攻 残酷地屠杀

日本帝国主义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全面侵华战争，是以速战速决为前提。故日军在占领北平（京）、天津、上海后，为了占据南京，夺取徐州，向中国的心脏腹地武汉入侵。于是从入侵安徽开始，

把安徽占领区作为他陆军与海军的集结与分兵。^① 所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以后,就把侵略安徽作为战略重点。气势汹汹地用空军为先导 陆军和海军齐头并进。从 1937 年 11 月 26 日日军飞机轰炸广德开始,半年多的时间中,安徽境内大部分县城和较大的集镇,均遭到日机的轰炸。据史料记载:炸死居民 7964 人 炸伤炸残 6460 人 烧毁房屋 128351 间 不少县城和集镇 几乎变成瓦砾废墟 江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日本陆军在空军的掩护下 先后侵入安徽境内集结作战的有 15 个师团和海军第三舰队的一部分 大片国土遭到日军铁蹄的残踏和蹂躏。

日本侵略军侵入安徽以后 其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掳是怵目惊心 对手无寸铁的安徽人民 几十、几百、几千、最多达到几万人的惨遭杀害。诸如 1937 年 11 月 30 日,日军占领广德时 被杀害的有 2 万 4 千余人;宣城县里桥区周围几十里的村庄,被日军烧了 4 天 4 夜,有 6987 户房屋被烧,有 26218 人被杀,被杀的人数占该区总人数的 70%;日军侵入芜湖市区时 见人就杀 据当时芜湖萃文中学校长美籍爱尔兰人华而顿的不完全的统计,被杀的就是 2 千 5 百多人 凤阳县被日军杀害的达 5 万余人。日本侵略军在安徽杀人之多 其暴行之惨 其损失之重 是安徽历史上任何一次灾难都是不可比拟的。据统计,8 年中全省人口净减少 104 万 从现有资料计算,其中直接遭受日军杀害的最低数要超过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总数的一倍以上,其灭绝人性的残酷程度,也是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它同南京大屠杀有区别的话,那就是集中与分散而已。

^① 1937 年 11 月,日军第 6、第 18 师团占领广德,分兵占领郎溪、宣城、当涂、芜湖、直逼南京。1938 年 1 月,日军第 9、第 11、第 13、第 102、第 107 师团从南京北侵,占领皖北,屯兵明光、滁州、蚌埠、宿县,会攻徐州。1938 年 6 月,日军占领武汉向中国腹地入侵,日本海军第三舰队 20 余艘兵舰及陆军 2000 余人停驻安庆;陆军集结在芜湖的有第 6、第 9、第 27、第 101、第 106 等 5 个师团;集结在合肥的有第 3、第 10、第 13、第 16 近卫等 5 个师团;分兵会攻武汉。

尤其是妇女 不论老幼和孕妇 日军见到就强奸、轮奸 凌辱惨死的比比皆是。至于日军入侵后，给安徽民间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惊人。仅据合肥县城 1946 年的调查统计 除 6000 余人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外，其民间直接的经济损失就达 5 千余万银元。

网罗汉奸 组织“维持会”

日本侵略军队在中国土地上 实行的“三光”（烧光、杀光、掳掠）政策及其威慑手段，并不能镇服中国人民，达不到长期占领目。安徽沦陷区的同胞，也没有在日军的屠刀下进行屈服。加之，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对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施行惨绝人寰地集体大屠杀的强烈谴责，迫使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中国施行“三光”政策有所收敛。于是他们就采用军事威慑与政治诱降的侵略方针，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由双手拿刀 改变为一手拿刀，一年网罗丧失国格人格的中国人，充当汉奸，组织“维持会”或“自治会”。用汉奸“维持会”作为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

日军初期在安徽沦陷区网罗的汉奸，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土豪劣绅和官僚政客，他们卖身投靠日军，建立起形形色色的“维持会”或“自治会”完全听命于当地的日本占领军及其特务机关的指挥。当时驻安徽沦陷区的日军，虽然番号多变，但基本上是属于日本陆军华中派遣军指挥下的蚌埠、南京、武汉 3 个陆军军事系统（类似 3 个军区）。各地的日本驻军和特务机关，也是由这 3 个指挥司令部的派遣和指挥。

蚌埠是津浦，淮南铁路的枢纽，战略地位重要。1938 年 2 月 2 日沦陷后，日本陆军华中派遣军直接派遣陆军少将尾崎为司令官（后为山村少将），设置了蚌埠警备司令部；派陆军大佐原田久男（后为樱庭子郎）为驻蚌埠特务机关长。日军蚌埠警备司令部和特

务机关于 1938 年 3 月扶植傅君实（江苏江亭人，原任皖系军阀倪嗣冲私人所办烈山煤矿会计主任）为委员长，建立起“蚌埠自治会”。

芜湖靠近南京，是长江沿岸的重要商埠。民国初年，日本就设有驻芜湖领事馆。1933 年后，其领事吉竹贞治一直羁留在芜湖。1937 年 12 月 10 日芜湖沦陷以后，日本陆军华中派遣军驻南京特务机关派出驻芜湖宣抚班，其班长矢野久吉和吉竹贞治先后扶植任凤昌（地痞流氓）和朱绣封（北洋军阀时期的芜湖县知事）为“会长”，建立起“芜湖地方维持会”（1938 年春改为“芜湖县自治会”）。

安庆，当时是国民党的安徽省会。1938 年 6 月 12 日，由进攻武汉的日本陆军波田支队 2 千余人，在第 3 舰队 20 余艘兵舰的掩护下占领，成为日本海军在长江的一个基地。安庆方面的日军和安庆特务机关受日军华中派遣军驻武汉地区司令部指挥。“安庆地方维持会”是安庆沦陷之前，由天津日军派遣潜回策应日军的汉奸、地方劣绅汪笃斋（安庆农工银行经理）建立的“自任”会长，接受日军安庆特务机关指挥。

蚌埠、芜湖、安庆的“自治会”（“维持会”）分别受蚌埠、南京、武汉日军军事系统及其特务机关的节制和指挥。由于日军之间拥兵自重，军令不一，从而驻安徽沦陷区的日军形成了蚌埠、芜湖、安庆 3 个指挥中心。日军扶植组织的“自治会”（“维持会”）也就逐渐自成系统，各自节制其周围大大小小的“维持会”。即：“蚌埠自治会”节制了合肥及其以北的皖北沦陷区；“芜湖自治会”节制了皖南沦陷区及江北的和县、含山、无为、巢县；“安庆维持会”节制了怀宁、桐城、宿松、望江及江南的铜陵、贵池、东流，直至江西的彭泽、湖口等。3 个傀儡中心在日军直接资助指挥下，各自创办了汉奸报纸《芜湖新报》、《蚌埠新报》、《安庆新报》，作为日本侵略军的喉舌，推行侵略政策。

利诱军阀 拼凑‘维新’

1938年3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中，扶植梁鸿志^①在南京建立起一个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以下简称“维新政府”）的傀儡政权。当时安徽沦陷区还没有统一的傀儡组织，因此同“维新政府”也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维新政府”同安徽沦陷区建立傀儡政权的隶属关系，是通过军阀余孽倪道烺建立起“安徽省维新政府”以后才形成起来。

倪道烺安徽省阜阳人，北洋军阀倪嗣冲的胞侄，是皖北地区反动的封建霸主^②。1938年2月日军占领蚌埠后，倪道烺就指使亲信傅君实、唐少侯充当汉奸，建立“蚌埠自治会”，自己便窜到北平（京），他在北平（京）经王揖唐^③的推荐，受到日军华北派遣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的赏识。又经喜多诚一向日军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维新政府”首席顾问原田熊吉推荐，让其回安徽“维持地方”。于是倪道烺从北平邀请了傀儡“北平自治会”秘书长朱荣汉、安徽桐城人、军阀时期在四川、湖南、河南当过县长、作为“智囊”偕同

梁鸿志（1882—1946）福建长乐人，北洋军阀时期投靠皖系军阀段祺瑞。为安福系骨干分子，担任安福国会参议员秘书长，段祺瑞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建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任行政院院长。抗战胜利后，1946年被处决。

倪道烺（1879—1951）北洋军阀时期任凤阳税关监督。1921年伙同马联甲镇压安庆学生运动，是制造“六二惨案”的元凶。1927年被张宗昌委任直鲁联军预备军军长，组军失败，返回蚌埠。在蚌埠广置田产，开设“德和钱庄”、“益丰银号”、“永济典堂”、“清莲阁澡堂”等等。1938年日军侵入蚌埠后，卖国求荣，当了汉奸，任傀儡安徽省长。1951年5月，被蚌埠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

③ 王揖唐（1877—1948）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任内务总长、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北方议和代表、安徽省长兼军务督办、为安福系首领之一。1937年日军侵入后，投降日本，当了汉奸，任傀儡华北临时政府内各部总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48年被处决。

倪道烺于 7 月初抵达上海，受到原田熊吉的青睐。加上梁鸿志、王揖唐、倪道烺以及朱荣汉等都是“安福系”的军阀，而“维新政府”的主要成员中，“安福系”军阀余孽又是居重要地位，他们彼此之间都俱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傀儡“维新政府”就在 1938 年 7 月 12 日发表倪道烺为“安徽省维新政府”省长。倪道烺受命后，就在上海筹组班底，用上海滩流氓金田为处长，于 7 月 15 日在上海成立“安徽省维新政府警务处筹备处”。

倪道烺受日军和“维新政府”的派遣，于 1938 年 9 月回到蚌埠，以蚌埠为所谓“省会”。首先用土匪头目沈席儒（蚌埠人）为“司令”，收罗土匪、叛军，建立起伪军“蚌埠绥靖军”。其次由金田兼“局长”收罗地痞流氓为“警察”，建立起伪“蚌埠警察局”（即所谓“省会警察局”）最后于 1938 年 10 月 10 日，在日军蚌埠警备司令官尾崎和特务机关长原田久男参加监督下，挂出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捧出倪道烺举行了所谓“省长就职典礼”。宣布了傅君实为“省府”秘书长，朱荣汉为“省府”参事，唐少侯为财政厅厅长，邓占卿为民政厅长，汪龙吟为教育厅长，贺佑民为建设厅长，金田为警务处长。相继在 10 月 27 日，又举行了所谓“安徽省维新政府开厅典礼”。倪道烺发表了所谓《告全皖民众书》，声称自己“遯返故乡，执行省政，得到友邦日本的协助。”献媚日本侵略军为“救护军”，是极力来保障我们良民的安全，对于我们民众是救护的。“叫嚷要‘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等等。

日军屠刀指挥下的“安徽省维新政府”，对安徽沦陷区的汉奸“维持会”进行了改头换面，先后成立凤阳、怀远、宿县、滁县、五河、合肥、盱眙、芜湖、当涂、嘉山、定远、亳县、灵璧、泗县、怀宁、巢县、含山、凤台等“县公署”（蚌埠、芜湖、安庆分别属凤阳、芜湖、怀宁县管辖），分别任命秦松亭、何君侠、陈巽生、黄新农、赵兰阶、方星樵、刘云波、朱绣封、张星侪、胡天扬、沈厚之、赵朗斋、刘子久、罗少云、马云腾、胡正刚、陆月芬、许治一等为上述各县的“县知事”。

在所谓“县公署”内设置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科，分管“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依照各县沦陷区的面积、人口以及所管辖的权限，在芜湖、安庆、合肥、滁县设立“警察局”，其它均设立“警察所”。蚌埠、芜湖、安庆市区建立了区、坊、保、甲的基层傀儡政权以外，其它各地的基层傀儡政权，仍旧是保持原来“维持会”的面貌。

“省维新政府”、“县公署”，一直到基层都是傀儡。只不过是“政府”、“公署”的政权形式，代替了汉奸“维持会”，用所谓“施政”的方式，代替了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一切权力都操纵在“太上皇”的“大日本皇军”手里。安徽省维新政府，除了听命于日军蚌埠警备司令部以外，事无巨细都要请示听命于日军驻蚌埠特务机关和“省府顾问”木村辰雄、“民政教育顾问”龟井俊影、“财政建设顾问”高井虎男。“县公署”以下，受各地日军特务机关或日军“联络官”以及大大小小的日酋的指挥制约。

安徽沦陷区傀儡政府的政治翼赞为“大民会”。这个鼓吹“大民主义”的“大民会”，是日本陆军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部于1938年扶植建立起来的，它和伪“满洲国”的“协和会”、华北的“新民会”同出一辙，是一个独立的汉奸组织。“大民会”的“总裁”是“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兼“会长”，孔宪铿任“总部部长”。安徽省维新政府“成立前”，日军特务机关主要抓“大民会”。芜湖、蚌埠、安庆的“大民会”，在日军的直接扶植指挥下，都设立了“总务”、“组织”、“宣传”等3个科和“宣传队”。安庆“大民会”还办了1个“兴亚剧团”。日军对“大民会”的会员，施行奴化教育，强制他们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从事汉奸活动，组织他们宣传“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建设东亚新秩序”。安徽省维新政府“成立以后”，对安徽沦陷区的“大民会”进行了系统地组建。由日军西村葵喜为“总辅导”，成立了“中国大民会安徽省联合总支部”。蚌埠、芜湖、安庆建立了“联合支部”，沦陷区各县建立了“分支部”。以所谓“振兴民德主义”提倡“大民主义”，推行“王道政治”为宗旨，强行

发展‘会员’。‘会员’中分‘普通会员’和‘基本会员’；‘普通会员’，一般都是强迫参加的城乡平民，参加时只须登记，不交会费；‘基本会员’，其中多数是所谓‘自愿申请’参加的中上层人士，须年交 2 元‘会费’，可享受半年‘通行证’的权利。‘安徽省维新政府’规定，凡‘公务人员’及‘正当’商人，‘均必须参加’‘大民会’，作为‘基本会员’，否则，就不能从事公务人员和经营商业的‘资格’。因此，当时蚌埠被迫参加‘大民会’的就有数千人之多。

群奸分治，相互攻讦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殖民地的统治是“分而治之”。在安徽沦陷区的日军，也是各自拥兵自重，从而也就形成了仰承其鼻息的傀儡之间的权利之争。故当时安徽沦陷区能够听命于‘安徽省维新政府’，倪道烺只有合肥以北十多个县，安庆和芜湖方面的傀儡，都是受封不受命。

安庆方面的汉奸头目汪笃斋和马云腾（原名马千里）虽然接受了倪道烺加封的‘省府参议’和‘怀宁县’‘知事’的头衔，但仍以“‘安庆王’自居，节制着怀宁、桐城、望江、宿松、铜陵、贵池、东流以及彭泽、湖口等 9 个县”的傀儡。对倪道烺的“‘维新政府’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财不缴，对所谓‘省府’的活动消息，《安庆新报》不但不刊载，而且还各自利用《安庆新报》和《蚌埠新报》互相攻讦。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争‘省会’（争安徽的傀儡中心）的闹剧。争论的高潮是汪精卫登台的前后，1940 年 4 月 1 日，《安庆新报》用所谓“‘安庆各界代表会议’的消息，‘整版’报导”了“会议通过‘殷惠廷’‘怀宁县公署第三科科长’‘筹人’‘要求安徽省政府迁回安庆’的‘提案’”，提出“‘国府’指汪伪政府‘既经树立，而蚌埠设立之皖省府，拟应迁回。’认为‘安庆具有 300 年历史之吾皖省治，一旦废弃，固属可惜。

而现省治之设于蚌埠，其地域则偏于皖境之东北隅，于政治推行殊多窒碍。”即在蚌埠推行政治，其力量只能循津浦线以达宿凤嘉滁区区 4 县，对于吾皖其它 50 余县则属鞭长莫及。”《蚌埠新报》则用“省府迁地之检讨”为题，连续发表“之一”、“之二”、“之三”3 篇“社论”驳斥“省会”迁回安庆。认为“安庆虽据长江中流，但就政治上与经济上之价值而论，其重要性殆非蚌埠可比。盖蚌埠拱卫首都，扼津浦南北交通之咽喉，苏鲁豫鄂皆可以一掌尽控制之能。而农产丰盛之源，又皆以蚌埠为其尾闾。往昔省府设于安庆，若与蚌埠之经济动态作比较，早呈相形见绌之憾。”《安庆新报》又以“省府应否迁回再商讨”、“省府应否迁回再商讨”为题，连续发表“社论”，加以反击。相互白热化的攻讦，直到倪道烺下台还未结束。

“安徽省维新政府”对皖南和皖中沦陷区是鞭长莫及，关系上若影若离。为此，1939 年 6 月，倪道烺得到日军华中特务机关部的支持，派出谷村为代表，偕同“省府参事”朱荣汉，以“视察委员”推行县政”为名，携代倪道烺 6 月 12 日《告全省民众书》和《告战区民众书》到芜湖、当涂、宣城、巢县、和县、含山、贵池、望江、铜陵、东流、怀宁，为倪道烺进行调查、访问、拉关系，并于 6 月 17 日和 6 月 30 日，分别在芜湖和安庆召开了“县公署知事”及主要集镇“维持会长”的所谓“联席会议”。经过朱荣汉代表倪道烺，谷村代表华中特务机关部，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说客”拉关系，虽然没有调和奸伪之间争权夺利的根本矛盾；若影若离的关系没有完全介决。但在微小的问题上停止了攻讦；对安徽沦陷区建立统一的傀儡政权起了作用。

汪伪政府的出台与群魔争冠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从形势上更加适应侵华战略的需要，所谓“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①，组织新的傀儡政府。于是就扶植汪精卫一伙叛国集团，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建立起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替代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当时人们讥讽地说：“前汉后汉都是汉奸”。他们在本质上虽然都是受日本侵略军的控制，仰承其鼻息的傀儡政权。但在形式上又有所区别：其一，人员构成方面，汪伪政府的主要成员是从国民党中央和政府中的一批投日叛国的中高级干部，政治上有一定的欺骗性。而“维新政府”的主要成员乃是中国人民早已唾弃的军阀余孽及劣绅恶棍，政治上早已失去了欺骗作用。其二，汪伪政府具有完备的政权形态、政治纲领以及所谓继承国民党的“党统”和“法统”。其三，日本帝国主义将汪伪政府作为整个沦陷区的“交涉对手”，在一定程度上又给予相对的“独立性”。这样以来，汪精卫一伙叛国集团在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上，更有欺骗性，更能起到日本侵略军用屠刀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汪伪“安徽省政府”是在“安徽省维新政府”的基础上改头换面过来的。先后经过倪道娘、高冠吾、罗君强、林柏生4任汉奸“省长”（“省主席”）其演变的过程和更替的内幕大体是这样。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72页。

魔头倪道烺 改组“安徽省政府”

傀儡“安徽省维新政府”省长倪道烺，早于 1939 年 7 月 10 日就通过傅君实、唐少侯、邓占卿、金田、秦松亭等 39 名汉奸头目以所谓“全省民众代表”的名义，通电拥护汪精卫，声称“东亚和平非公莫属，全皖民众一致拥护”。汪精卫在南京所谓“还都”以后，于 1940 年 4 月 3 日致电“安徽省政府”，一切政务暂维现状，各职员照常服务。“只是将‘安徽省维新政府’改名‘安徽省政府’，用青天白日旗加上一条书有‘反共和平建国’黄色三角飘带的旗帜，替代了军阀‘五色旗’。当时汪伪政府同‘维新政府’在安徽沦陷区仅是更名易旗而已。”

1940 年 9 月 19 日，汪精卫为“主席”的“中央政治会议”第 21 次会议，通过改组“安徽省政府”，将“省长制”改“委员制”，“省长”改名“省主席”，任命倪道烺、傅君实、叶震东、陶思澄、邓占卿、钱慰宗、徐仲仁、张拱辰、胡志宁等 9 人为“省政府”委员，倪道烺任“省主席”，傅君实兼“秘书长”，叶震东兼“民政厅长”，陶思澄兼“财政厅长”，钱慰宗兼“教育厅长”，邓占卿兼“建设厅长”，徐仲仁兼“警务处长”。汪伪“行政院”又相继任命了张孝琳为“省高等法院”院长，胡大为《安徽日报》社长，张懋基、周伟侯、马凤池为“省政府”第一、第二、第三科科长。改组后，“安徽省政府”的主要成员中，大部分调换了汪伪集团中的人员。由于汪精卫对倪道烺使用了怀柔手段，使他受宠若惊，亲赴南京朝觐，并向“报界”发表所谓“皖府改组后的施政方针”，声称“追随汪公，尊重友邦，搞好中日提携，树立东亚新秩序”。

倪道烺秉承汪伪政府的“命令”，改组了“安徽省政府”以后，自 1940 年 10 月 1 日起，改“县公署”为“县政府”，改“县知事”为

“县长”。相继任命秦松亭为凤阳“县长”，马云腾为怀宁“县长”，方星樵为合肥“县长”，胡延禧为芜湖“县长”，张策勋为当涂“县长”，吴振璜为无为“县长”，胡正刚为巢县“县长”，翟输樵为和县“县长”，程德耆为怀远“县长”，许治一为凤台“县长”，徐志一为寿县“县长”，沈厚之为定远“县长”，贾子元为涡阳“县长”，石鸿勋为滁县“县长”，侯棠生为来安“县长”，邵萍石为嘉山“县长”，孟坚为盱眙“县长”，张裕焕为五河“县长”，吕咏春为全椒“县长”，周希孟为宿县“县长”，刘子久为灵璧“县长”，熊公烈为亳县“县长”，罗少云为泗县“县长”，邵世恩为肖县“县长”，孙竹房为砀山“县长”，魏连城为下塘集“特别区署长”（伪“县级”，下同），王光琪为大通“特别区署长”（1944年4月“下塘集特别区”改为“兴淮特别区”，大通特别区“改为”定淮特别区”）。1942年以后，安徽沦陷区先后成立汪伪“县政府”的有繁昌、宿松、贵池、望江、铜陵、东流、彭泽、湖口（彭泽、湖口两县于1943年5月划回伪“江西省政府”）、宣城、广德、郎溪、南陵等县。因汪伪“省政府”对“县长”以上的任用只有提名权，而决定权在汪伪政府。所以安徽沦陷区“县长”以上的汉奸头目经过几度“调整”、“任命”基本上都换成了汪精卫集团中的成员了。

汪伪“县”以下的基层傀儡政权按汪伪政府的规定：“县”之下设区，凤阳、滁县、当涂、芜湖、怀宁、合肥、和县、定淮、兴淮等为“一等县”，设10个区；全椒、天长、巢县、嘉山、贵池、无为、繁昌、宣城、怀远、铜陵为“二等县”，设6个区；来安、望江、盱眙、五河、东流、桐城、宿松、定远、凤台、寿县、广德、郎溪、含山等为“三等县”，设三个区。“区”之下设“联保”，10“联保”以上为“甲等区”，6“联保”以上为“乙等区”，3“联保”以上丙等区。“联保”之下设“保”，“保”之下为“甲”，“甲”之下为户。一般是10户至20户的一“甲”，8“甲”至12“甲”为一“保”。汪伪政府对担任基层傀儡政权的“区长”、“联保主任”、“保长”的“资望”和“文化程度”等各方面虽都作了“规定”，而实际担任这些职务的都是原来汉奸“维持会”的一班劣绅、地痞、流

氓一类的社会渣滓。

安徽的头号汉奸倪道烺，虽然效忠日本，不竭余力地推行侵略政策，拥护汪精卫，秉承汪伪的旨意，从改组“安徽省政府”到建立汪伪基层傀儡政权，历时近两年。但是，他毕竟不是汪精卫集团的嫡系，致在1941年12月18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让位于高冠吾，只捞到一个汪伪“国民政府”委员的空衔。

“维新派”要员高冠吾从江苏被挤到安徽

高冠吾，江苏崇明人，军阀出身。日军入侵后，当了汉奸，参与梁鸿志组织“维新政府”，任“绥靖部”次长、南京市“督办”、“市长”。1940年1月，他以“维新政府”的“维新派”代表出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府”主席。高冠吾从江苏省“主席”调任安徽省“主席”，是汪精卫集团同“维新派”的权力之争的结果。

高冠吾虽被汪伪集团从江苏挤到安徽，“实惠”上不如江苏，但在名义上并未降低。因此，他对汪精卫仍是诚惶诚恐，秉承汪精卫的意志办事。所以他未到安徽就任之前，于1941年12月21日在南京发表了忠于汪精卫、“推行新国民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四项所谓“施皖方针”。1942年1月1日在蚌埠就职安徽“省主席”时，又发表了“追随汪公”的“就职宣言”。同时宣布了“安徽省政府”的改组，王震生、董修甲、马骥材、钱慰宗、徐仲仁、谢泽同、魏曙东、邓占卿为“省政府”委员。谢泽同兼秘书长，王震生兼“民政厅”厅长，董修甲兼“财政厅”厅长，钱慰宗兼“教育厅”厅长，马骥材兼“建设厅”厅长，徐仲仁兼“警务处”处长。嗣后又用严恩祚调换了钱慰宗的“教育厅”厅长，用魏曙东调换了徐仲仁的“警务处”处长。

高冠吾在安徽，虽然搬来了他在“江苏省政府”的旧班底，撤换了倪道烺的旧班底，独揽了党政军大权。但“强龙压不住地头蛇”，

安徽沦陷区仍被蚌埠、芜湖、安庆 3 股帮派势力所控制，使他处于鞭长莫及，势于架空的境地。于是他就吸取自己在江苏“清乡”中，被汪伪嫡系李士群夺权的教训，用“清乡”为名，抓实力。自己兼任“安徽省保安司令部”的司令和“清乡委员会驻皖办事处”的主任；增设了“省政府保安处”建立了伪军“省保安团”。借芜当地区重点“清乡”把“清乡委员会驻皖办事处”以及“清乡”的党政机关全部设在芜湖，自己以“指挥清乡”常驻芜湖，控制皖南。高冠吾对安庆则是以“视察”为名，经常去进行“拜访”、“抚慰”、“疏通”、“交友”，推行所谓“上下通融和一致的理念”。如在 1942 年 5 月，他用了将近 20 天的时间在安庆方面进行上下“疏通”，利用倪道烺与安庆地方的矛盾，许诺“省会”将来仍迁回安庆，承认“怀宁县特殊，应以怀宁为中心兼管各县”。于是在 1943 年 1 月 8 日正式建立“安徽省政府安庆办事处”，任命马云腾为“办事处”主任兼怀宁“县长”，宗继舜为“办事处”副主任兼安庆“警察局”局长，代行“安徽省政府”管辖怀宁、宿松、桐城、贵池、铜陵、东流、彭泽、湖口等 8 县。

高冠吾以“省会”所在地掌管蚌埠，为“清乡”坐镇芜湖，用“分权”、“封官”拢络安庆。这 3 条办法虽然稳住了安徽沦陷区 3 股地方汉奸势力，但对安徽沦陷区的所谓“地方财政”，仍是难以驾驭。前任倪道烺留下的亏空达数十万元，“财政”实权仍被倪道烺一批地方汉奸所把持。高冠吾虽先后用他在江苏的“理财能手”董修甲、谢泽同任“财政厅”厅长，对“地方财政”进行了“竭力整理”，还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正。*1943 年 1 月 20 日汪伪最高国务会议“第 2 次会议通过”调整地方行政机构，改“省主席”为“省长”；“省政府委员”改任“参事”；“厅长”改为“专任”；撤销“民政厅”、“秘书处”改设“政务厅”。高冠吾就乘这次“省政府”改组调整的机会，重新使用了倪道烺的亲信傅君实为“财政厅”厅长，使用邓占卿为新增设的“经济局”局长，利用安徽地方汉奸势力为他主持“地方财政”。高冠吾为了防止“财权”旁落，亲自兼任凌驾于“财政厅”和“经济局”

之上的“安徽省物资调查委员会”的委员长，直接负有统管、检查、督促这两个部门的权力。

汪精卫集团对“维新派”的主要人员采取的是先“中央”后“地方”取而代之的策略。高冠吾从江苏挤到安徽以后，虽然效忠日本是不遗余力，对汪精卫的吹捧也是无以复加，但也不能挽回被汪伪嫡系排挤的命运。于是在1943年12月30日汪伪“最高国务会议”第36次会议通过高冠吾调任“江西省政府”省长而安徽的“省长”宝座让位于汪伪嫡系罗君强。

罗君强出任“维新派”在安徽彻底崩溃

罗君强，湖南湘乡人。他与周佛海是同乡，一贯受到周的宠信，倚为左右手。1939年8月28日被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兼副秘书长，从而成为汪伪集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汪伪政府成立后，罗君强当了“边疆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个所谓“边疆委员会”虽属“部”一级，实际是无“疆”可管，无事可为的空头衙门。所以罗君强仍然是附从周佛海，在上海出任“中央税警学校办公厅”主任，代行兼任校长周佛海的职权，并兼任“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为周佛海在上海抓枪杆子。

罗君强出任安徽，其直接因素是同1943年12月19日上海“共舞台事件”^①有关。“共舞台事件”发生以后，受到上海人民极大

^① 共舞台事件：1943年12月19日下午5时许，有伪税警团“税警”数人在“共舞台”看戏没有买票，受到上海汪伪“警察”干涉，双方由争执到动武，最后把几名没有买票的“税警”抓了起来。罗君强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这是汪伪上海警察局长苏德成有意给他的难堪，便立即派两个连“税警部队”前去参战。苏德成也不示弱，也增派“警察”部队迎战。双方在上海“大世界”东首，展开了一场火力混战，双方各有死伤。尤其是有50余名过往行人受到伤亡，民愤极大。

地指责。汪伪政府为遮人耳目，周佛海也感到罗君强不宜在上海带兵。于是就乘汪伪江西‘省长’邓祖禹下台，因安徽的‘油水’比江西大，便将高冠吾挤到江西，让罗君强出任安徽‘省长’。

罗君强从上海率领“中央税警学校警卫营”200余人，于1944年1月20日到达蚌埠，22日接任‘省长’。用胡泽吾为‘政务厅’厅长，罗光煦为‘财政厅’厅长，杨又春为‘建设厅’厅长，严恩祚为‘教育厅’厅长，满其蔚为‘警务处’处长，郭尔珍为‘保安处’处长，王翰章为‘经济局’局长，彭望轼为‘粮食局’局长，蔡羹舜为‘清乡事务局’局长，何仲英为‘宣传处’处长。除‘教育厅’严恩祚以外用的全部是周佛海的‘湖南派’。”

罗君强在安徽沦陷区除了听命于‘主宰’安徽的日酋以外，就是听命于周佛海，为其扩展势力范围。自己担任了汪伪“军事委员会蚌埠绥靖主任公署”的绥靖主任兼‘安徽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组建了3个直属‘保安团’，任命警务处长满其蔚兼任总团长，组建了“安徽省警防总团”，扩大了“警察”部队，任命保安处长郭尔珍为指挥，建立了“中央警卫总队驻皖指挥部”。罗君强以“军事委员会蚌埠绥靖主任”的名义，直接指挥在安徽的“中央”伪军和地方伪军，用所谓推进‘清乡’和支持‘大东亚圣战’为由，扩充地方伪军，建立起‘县’的‘保安团’或‘保安大队’。在‘行政权力集中于省长’的集权下，1944年3月撤销了‘安徽省政府安庆办事处’，设立8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用谭庶潜为‘专员’，在凤阳设立‘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管辖凤阳、怀远、五河3县，用何仲英为‘专员’，在田家庵设立‘第二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管辖寿县、凤台、定淮、兴淮4县区，用周乐三为‘专员’，在明光设立‘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管辖嘉山、盱眙、定远3县，用郝郊韩为‘专员’，在滁县设立‘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管辖滁县、全椒、来安、天长4县，用林仰溪为‘专员’，在巢县设立‘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管辖巢县、合肥、含山、和县4县，在芜湖设立‘第六行政区督察专

员公署”；专员“由兼任”第一清乡区专员“罗君强兼”管辖芜湖、当涂、繁昌、无为 4 县。用黄一平为“专员”在郎溪设立“第七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管辖郎溪、宣城、广德 3 县。用高燮为“专员”在安庆设立“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管辖怀宁、桐城、望江、宿松、贵池、铜陵、东流 7 县。“专员公署”所在地的“县长”，一律由“专员”兼任。高冠吾及“维新政府”时期遗留下的“县长”以上的人员，全部进行了调换。同时以所谓培植“县长”以下的地方行政干部，于 1944 年 8 月 1 日在蚌埠开办了“安徽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罗君强自任“校长”设置了“警保”、“县佐”、“财政”、“清乡”（“清乡班”设在芜湖）4 个班 150 余人。

1944 年 11 月 10 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死了以后，南京汪伪政府内的派系斗争更加明朗化。陈公博在陈璧君为头子的“公馆派”的支持下，替代了汪精卫，跃居伪“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 3 大要职。陈公博虽有“公馆派”支持，大权独揽。但他对湖南实力派的头目周佛海，不得不从事拉拢，以巩固其头号汉奸的地位。因此，周佛海除原来担任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的头衔以外，又夺得了上海“特别区”的“市长”兼“上海公安局”的“局长”。汪伪诸逆都视上海为“肥缺”，“公馆派”也想指染。所以，周佛海既不放弃“中央”大权，又不让“公馆派”指染上海的“肥缺”。于是就以罗君强为替身，通过“最高国务会议”任命罗君强为“国民政府”委员，“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为周佛海在上海代折代行。为了调和“公馆派”的矛盾，就将安徽“省长”让给了“公馆派”的林柏生。

为了最后“捞一票”林柏生一伙蜂涌到安徽

林柏生 广东信宜人。抗日初期，为汪精卫在香港主持《南华日